

循名责实：技术封建主义的概念沿革、研究表征与悖谬反思

杨云霞 叶恒语

摘要：技术封建主义是识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又一新兴范式。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技术封建主义”语义塑成于国外学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掠夺性增强态势及信息技术垄断效应的审视，“再封建化”和“新封建主义”分别构成该术语的前置命题和思想母体。作为以封建主义架构为坐标来反映当代数字革命和科技发展的思潮，技术封建主义在中西方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理解路径：国外左翼和右翼惯于以经济或政治变革为标准将其释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质变形态；国内学者们透过政治经济学视域照见其实质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内生变种。回到马克思对于社会形态的总体性认识视界中，技术封建主义假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产品分配、权力支配秩序以及生产力发展等维度上，存在误判人的数字化生存状态、误解数据生产过程、误读地租与利润形式以及误断数字资本驱动生产作用的思考误区。在厘定技术封建主义仍未超脱出资本主义现代性框架的基础上，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强化对数字主体性的寻绎，为共产主义要素解放创造理论前提与现实可能。

关键词：新封建主义 技术封建主义 数字资本主义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 劳动产品分配 云地租

“技术封建主义”一词首次出现于 1990 年。美国游戏设计师洛伊德·布兰肯希普在其所著的《赛博朋克：高科技、低生活角色扮演说明书》中，明确使用这一概念来表述大型高科技公司在应对外部经济结构考验时的“优先自我保护”态度。^①随着互联网平台模式的时兴，数字化版本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受到层层追问，技术封建主义由此作为人类未来社会形态的一大可能方案被引入关于

[作者简介] 杨云霞，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重点舆情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叶恒语，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省重点舆情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 陕西西安 710129

[收稿日期] 2024-12-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研究”（编号：22VRC06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编号：23ZDA082）；西北工业大学博士论文创新基金项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视域下人的现代化研究”

^① Loyd Blankenship, *Gurps Cyberpunk: High-Tech Low-Life Roleplaying Sourcebook*, Austin: Steve Jackson Games, 1990, p. 104.

“历史的终结”的讨论。技术封建主义论认为，行将末路的资本主义尽头并非自由与繁荣，而是由科技加持的新型封建统治秩序。极为罕见的是，这种唱衰资本主义“开动历史倒车”的论调竟在国外左右思想派别均获得了青睐，其意外流行的背后成因不免引人反思，针对技术封建主义的循名责实^①式研究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具体而言，作为一种伪马克思主义思潮，技术封建主义是何以成型的？其在当代国外学界有哪些理论面向？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技术封建主义是否真实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状？我们该针对哪些思想误区对其进行清算？解答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回到马克思那里觅得灵感。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索中，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同前后相接的两种社会形态联系中获得自身规定的，它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兴衰逻辑直接反映着人类史上几种不同社会形态单元之间的过渡演进，因而也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棱镜。基于此，进一步开掘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广阔意涵，可以为合理审视数字资本主义封建要素衍化、廓清技术封建主义的历史限度、确立数字时代科学社会主义价值旨归提供思路启示。

一、技术封建主义的概念前史及语义考释

技术封建主义的英文 techno-feudalism 包含“技术”和“封建主义”两大构词元素。在马克思主义视域里，技术通常被看作一类先进的生产力质态，而封建主义则代表着一层特定的生产关系，这样将分别指向生产方式两大方面的一对范畴组合拼接的造词做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尚不多见，也侧面反映出国外学者在创设这一术语时想要赋予其复杂意涵。显然，“技术封建主义”不是脑海里的空穴来风，而是经由一定现实根据和思想线索交织而成的产物。从学术思想史来看，“技术封建主义”的语义成形源于两条前后递进的脉络线索：一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历史透视，二是对新自由主义催生的技术垄断效应的时代反思。

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垄断性空前增强的趋势得到了西方学界的普遍关注，这直接构成了技术封建主义的问题缘起。相关话题的开端可以追溯至哈贝马斯提出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②概念。他集中考察了国家干预的资本积累模式盛行以来，欧美社会公共领域受到的政治权力渗透现象，认为这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应对经济衰退，但同时不可避免地打破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分基础——公共领域。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转型的新阶段，诸如剧院、咖啡厅等以往奉行价值中立的社交聚会场所不再饱含批判精神，而是被重新政治化起来，极其类似于封建社会晚期通过新闻检查制度等手段对私人领域的管制。

把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的封建色彩更进一步放大的是与哈贝马斯同时代的霍布斯鲍姆，后者不满意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泛化定位，指出世界上部分地区和国家（比如拉丁美洲）尽管施行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残存着以庄园制为代表的小农经济模式。霍布斯鲍姆将这种委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又尚未完全脱离传统农耕作业的社会形态冠名为“新封建主义”^③。新旧世纪之交，大卫·哈维提出的“剥夺性积累”资本割据运动新样态为技术封建主义奠定了学理基础。迈克·赫德森则把房

① “循名责实”出自《韩非子·定法》，意思是按照名称或名义去寻找实际内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7页。笔者引用这一词语意在说明，作为言说社会形态质变的技术封建主义是否准确反映了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尚需进一步核实与考证。

②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30—231页。

③ E. J. E. Hobsbawm, “A Case of Neo-Feudalism: La Convención, Peru,”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1, No. 1, 1969.

地产、保险等远离生产劳动的领域涌现出的寄居于低收入人群债务和租金的从业者定义为“新食利阶层”^①。西格哈德·内克尔大胆地推断新自由主义现代化进程正在导向“没有资产阶级结构的资本主义”^②。这些研究都旨在解析一个道理，即不论是私有制形式的转移，还是阶级剥削形式的改变，资本主义内部都已经产生了拒斥自我社会准则的抗体。

信息时代的来临导引着新封建主义的研究重心偏向技术与知识问题。阿兰·苏皮奥特认为，新自由主义和数字化是再封建化的两个主导推动力。^③在自由主义改革削弱反垄断的背景下，来自硅谷的技术精英开始疯狂涉足原先国家禁止私人承包的项目领域，IBM、微软、辉瑞等科技巨头通过参与起草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在全球知识与技术价值链当中将自己树立为客观的评价标准，从而成为挑战资产阶级国家法治的第三方规则执行者，这让人不禁回想起效忠和依附关系泛滥的人治社会。罗伯特·库特纳等人指出，技术平台所有者创建了一种专有制度，他们可以通过苛刻的条款来压制竞争对手，通过引导用户签订复杂协议侵犯消费者隐私，从而创造了一块不依赖公法的区域，在现象上类似于中世纪私人领地的复活。^④在这块21世纪的“私人领地”上，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数据交换关系看似新颖，实则包裹着一层封建劳动关系。格伦·韦尔和埃瑞克·波斯纳援引了这样一个史实：以往的封建领主使农奴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保证农奴在领地内的生存安全和使用土地劳作的权利，作为交换，领主从农奴的农业产出中获取所有市场收益。他们认为这无异于时下数据服务器为用户提供有用信息资源以换取其产生的数据价值，于是将这种生产交换模式称为技术封建主义。^⑤

通过梳理“再封建化—新封建主义—技术封建主义”的逻辑演进，我们可以发现，“技术封建主义”概念是在国外学界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垄断性增强的趋势以及信息时代食利主义兴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其至少被预设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代指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⑥，二是表征基于法权形成的私人（私企）权力全球性扩张^⑦。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封建主义起初是在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等语境下臻于成型的，其直面的社会现实与当前数字技术全方位统御的资本主义时代存在着云泥之别。同时，在新封建主义向技术封建主义的叙事转型阶段，国外学界对于传播媒介再政治化、科技企业私权膨胀的分析主要还是针对特定领域封建元素的局部性描述，尚未上升至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全局性诊断。

二、国内外学界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研究动态

（一）域外左右阵营的论争及各自缺陷

真正将技术封建主义推向理论前沿的是2020年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出版的《技术封建主义》一书。在该书的结语部分，迪朗精辟地谈到这一题旨的最新诠释取向，以及它受到进步和保守两派势力共同关注的内因：“确定当代资本主义的质变仅仅是个开始，但它足以引发强大的视差效

① Michael Hudson, “The Road to Debt Deflation, Debt Peonage and Neofeudalism,”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Working Paper No. 708, 2012.

② Sighard Neckel, “The Refeudaliza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6, No. 3, 2020.

③ Alain Supiot, “The Public-Private Re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oday’s Refeud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Vol. 11, No. 1, 2013.

④ Katherine V. W. Stone, Robert Kuttner, “The Rise of Neo-Feudalism,” *The American Prospect*, 2020-04-08, <https://prospect.org/economy/rise-of-neo-feudalism/>, visited on 2024-12-19.

⑤ Eric A. Posner, E. Glen Weyl, *Radical Markets: Uproot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or a Just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31.

⑥ 潘天成：《技术垄断：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批判——基于对“新封建主义”的分析》，《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⑦ Peter Drahos, “Information Feud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11, No. 3, 1995.

应，同时打击自由主义谬论及挑战其唯一真正的对手——马克思主义传统。”^①不久后，著名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和前希腊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关于封建回归的对谈视频风靡网络，技术封建主义迅速成为全球公众的兴趣焦点。更为精彩的是，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和塞德里克·迪朗相继在《新左派评论》上针对技术封建主义理性展开了批判与反驳，塞西莉亚·瑞卡普、迈克尔·哈德森等多名学者也纷纷撰文加入论辩。西方左翼与右翼竞相抢夺技术封建主义的话语高地，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学术热点。

右翼阵营鼓吹技术封建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是保守派地理学家乔尔·科特金。他在2020年出版的《新封建主义的来临：对全球中产阶级的警告》中使用“科技封建主义”（high-tech feudalism）来突出说明控制着少数几家实力超群的科技公司领导者正在像专制的统治阶级一样不断征服宝贵的数字资产，重塑一个更加分层的经济和社会秩序。^②在科特金的自由主义想象中，封建主义取代了以前共产主义的敌对地位，将美国的未来推向存在流动性障碍的大规模农奴制。与科特金抨击资本主义被所萦绕的专制意识形态腐蚀不同，一些激进右翼人士将技术封建主义视为一个值得接受的项目，比如坚持技术至上、肯定乃至试图强化等级制的加速主义者尼克·兰德，要求搜索引擎打破浏览量高低顺序的自然呈现结构、人为划定浏览器秩序的美国新反动主义者柯蒂斯·亚文。他们的观点赢得了以中产阶级为代价而致富的技术精英阶层的支持，贝宝（PayPal）的创始人彼得·蒂尔公开谈及封建主义与初创科技公司之间的联系“更像是古老的封建结构”，并用实际行动为柯蒂斯·亚文的封建化搜索引擎项目注入赞助资金，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构序的元宇宙更是被指认为一个完全由私人封建主监管的公共空间。种种迹象表明，美国高科技企业家及其金融界盟友已经与技术封建主义的极端右翼之间达成了一种“摇旗擂鼓”般的默契，他们试图用言行说明：等级制比民主制更加切实有效。

尽管左翼主观上不希冀封建社会复辟，但仍不自觉地被右翼“牵着鼻子走”，滑向技术封建主义的话语窠臼。在极力批判技术封建主义理性的莫罗佐夫看来，左翼如此陷入理论和立场的悖反困境，主要是因为像右翼那样“更多诉诸道德而非理论分析的宣言中有足够的震撼价值，足以唤醒昏昏欲睡的公众”^③。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约迪·迪恩的阶级秩序分析，她的论述总是尽可能地避开技术因素，再度遁回新封建主义叙事，主张新封建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倒退，直接表现出四重政治特征：分封主权的回归、新型领主和农民的出现、城乡间的疏离、神秘主义意识形态的加剧。^④亚历山大·沃特斯在此基础上作出补充：技术封建主义本质上是一个重新回到前民主社会形态的过程，它代表着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决裂，是迈向根本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的转折点。^⑤

少数几个左翼学者围绕信息和数据网络本身的性质将数字经济导向了租金和剥夺的封建逻辑提出了相对独到的见解，大抵有两类阐释进路。一是瓦鲁法基斯（又译为瓦鲁法克斯）的数字空间分析。“独占获得灌溉的肥沃土地，是典型的权力来源”^⑥，他借用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说明大规模土地的私有化是统治阶级掌握权力的起因，而这同样解释了技术封建主义的存在论根源。在大数据时代，由资料库、服务器、信号感测器和全球电缆网络共同构筑的平台本被畅想为一个资源共享的云端新公地，实则被科技巨头别有用心地介入并圈占为个体所属的“云领土”，在那里，云端新贵们既操纵了社会

① 塞德里克·迪朗：《技术封建主义》，陈荣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94页。

② Joel Kotkin, *The Coming of Neo-Feudalism: A Warning 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20, pp. 51–52.

③ Evgeny Morozov, “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 *New Left Review*, Vol. 133/134, 2022.

④ Jodi Dean, “Neofeudalism: The End of Capitalism?” in Penny Lewis, Lorens Holm, Sandra Costa Santos eds., *Architecture and Collective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 44.

⑤ Alexander Waters, “When Tech Disrupts Democracy: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Populist Social Movement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Techno-Feudalism,” *Sample Chapter of Doctoral Thesis –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RMIT University, 2020.

⑥ 雅尼斯·瓦鲁法克斯：《云端封建时代：串流平台与社群媒体背后的经济学》，许瑞宋译，香港：卫城出版，2024年，第73页。

链接秩序，又扎紧“藩篱”提高了准入标准。通过对技术封建主义的空间本质的透析，瓦鲁法基斯向我们展示了以云技术为底座的数字公地正在被科技寡头肆意僭越，这也是他的观点被称为云主义的重要原因。二是迪朗的无形资产分析。他把计算机代码、设计、数据库或程序等可以无限复制但不失其内在品质的非竞争性资产定义为“无形资产”，具体囊括知识产权租金、自然垄断租金、级差地租、动态创新租金四种样态。正是由于数字平台对于无形资产的封建式掠夺，资本主义生产被数字地租所取代。与上述约迪·迪恩和瓦鲁法基斯的分析有所区别的是，迪朗更倾向于将技术封建主义看作一种假说而非定律，原因在于数字收租的合理区间无法像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那样得到一个严格的公式测算，无形资产的掠夺更像是在攫取旧时代领主一样的地位优势而非可量化的利益价值。

概而述之，国外左右阵营在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发生质变的本体论分析上基本趋同，主要的分歧在于认识论层面。右翼把技术封建主义看作一种与等级、身份相挂钩的社会政治形态，体现着权力私有化、分散化对自由的戕害；而左翼更偏向于将技术封建主义认定为一种经济体系演变，重点探讨寄生性统治阶级盘剥其他一切阶级的普遍性意义。在各自阵营内部，由于识见技术封建主义意象的态度差异，又衍生出五光十色的派别谱系。

对于传统右翼而言，技术封建主义的言说路线通过阐明封建逻辑的弊端以及资本主义面临政治腐蚀、处于倒退的历史边缘，反证资产阶级统治的优越性，最终服务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少数极右翼知识分子宣扬少数人集权的等级制在资源调配方面所谓的“真理”意义，在全球激增的民粹主义运动中骗取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现实政治层面，以古典自由主义为论证基础的传统右翼观点更加容易打动化石燃料、房地产和大农业等领域的实业资本家，而极右翼的学者、政客则是与号称资产阶级新贵的科技垄断集团暗相勾连。

考虑到欧美国家政权本质上是维护资本家利益，因此右翼的影响力天然高于左翼。在不利的舆论环境下，左翼阵营在技术封建主义的交锋中出现了理论混乱：许多研究摒弃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要义，像右翼那样沉迷于道德义愤；部分学者虽拒绝使用“技术封建主义”，仍选择数字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批判理路，但多只是在形式上坚持，被诟病为在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创新方面疲软无力。颇为罕见的是，以迪朗为代表的少数新生代学者近几年异军突起，他们同时兼顾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对右翼思潮进行清理的基础上，从阶级关系重塑、虚拟资产掠夺和权力空间变革等角度贡献了较为完备的解读框架。虽然这些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解释依然值得商榷，但是必须肯定当代左翼在探索资本主义从强调生产转向强调收入榨取^①的变化机理，进而戳破资产阶级炮制的劳动创造财富谎言、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垄断实质方面的积极意义。

（二）国内研究进展及有待拓展的空间

我国的技术封建主义研究起步于2023年，整体可分为翻译引介、理论阐释和反思批判三种类型。首先，部分译者将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的两部颠覆性力作（瓦鲁法基斯所著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 及迪朗所著 *Techno-Féodalisme*）以中文译著形式出版^②，并通过对话访谈跟进齐泽克、莫洛佐夫等知名左翼关于公共资源私有化加剧民族国家竞争^③和现代金融被剥夺与寄生逻辑所取代^④的最新见解，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封建主义的中国化传播。

在此基础上，本土学者们综合国外各路言说范式的共同旨意，厘定技术封建主义的立论依据和基本主张。涂良川等人着眼上层建筑层面，指出技术封建主义本质上是科技进步的政治退步，资本建塑

① 李连波、刘洛赫：《国外政治经济学最新研究述论（2023）》，《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8期。

② 参见前引许瑞宋译《云端封建时代：串流平台与社群媒体背后的经济学》和陈荣钢译《技术封建主义》。

③ 赵丁琪：《倦怠社会、技术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访著名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6期。

④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对技术封建主义理性的批判》，蒋林译，《外国语文》2024年第2期。

的技术依附是召回封建权力的源头。^① 潘天成分别从数字平台的所有制形式（新领地）和数字劳动的剥削方式（新农奴）对新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予以审视。^② 赵淳等人提出，技术封建主义投射出一种规范、扭曲主体心理和行为的文化霸权，即通过知识掠夺和大数据推送对社会心理施加操控和规约。^③ 吴鑫则以总体性视域提出技术封建主义包含经济层面生产资料的集中化、政治层面权力的专制化、社会结构的两极化等核心特征。^④

在诠释技术封建主义的过程中，我国学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外来思潮充斥着理论上的迷惑性，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视野对其进行仔细甄别。学者们发现，技术封建主义的国外理论动态呈现出将经济政治狭隘对立的二律背反。对此，李帅等人从利润和地租的主次地位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现代表现出发，分别拆解了作为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的技术封建主义迷思。^⑤ 蓝江等人开显了“云土地—云租金—云贵族”的历史发生学构序逻辑，进而为后续的批判性研究奠定了微观与宏观两条致思理路：其一，从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区别出发，围绕“云地租是否取代利润”展开证伪分析^⑥；其二，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针对“云平台是否祛除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展开结构审察^⑦。已有的批判虽各有侧重要点，但都一致认为，技术封建主义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本体呈现^⑧，在理论层面是因国外马克思主义混淆剩余价值形式所致的畸形产物，在现实层面则表现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亚形态。

经过国内学界的初步讨论，我们对技术封建主义的批判态度得以鲜明树立。这一生发于国外数字资本主义批判论域的社会思潮，实则是在当代左翼理论匮乏无力的背景下，由右翼人为分离经济要素与政治手段并旨在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统治而完成的一次新自由主义理论“变形记”。由此，后续相关研究的重心便不在于厘析技术封建主义“何以谓之”的确立逻辑，而在于究察这一理论在观照资本主义经验世界时的片面与失实，也就是遵循一条“何以否之”的祛魅理路。在这方面，学者们已经从政治经济学着手形成了较为充分的铺垫（上述第一条路线），但是在如何扬弃封建生产要素、进而打开革命解放道路的历史唯物主义考证方面（上述第二条路线）尚存在一定的话语空白。同时，技术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轮廓在学者们对经济政治变化的全面分析中不断清晰，为后续研究拓宽了论域外延。从某种程度上说，技术封建主义的涌现是对“两个必然”中“第二个必然”的直接挑战和根本悖逆。据此，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重思数字资本主义是否走向终结、下一步又将向何处去，进一步打开技术封建主义研究的批判视野。

三、回到马克思：祛魅技术封建主义“普照的光”

社会形态是马克思进行历史书写的核心思考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问

① 涂良川、潘依林：《技术封建主义：科技进步的政治退步——当代西方左翼“技术封建理性批判”刍议》，《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② 潘天成：《技术垄断：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批判——基于对“新封建主义”的分析》，《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③ 赵淳、曾丽瑾：《技术封建主义：文化霸权的新向度》，《外国语文》2024年第2期。

④ 吴鑫：《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批判》，《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⑤ 李帅、李震邦：《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二律背反：技术封建主义抑或数字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战线》2024年第3期。

⑥ 周亦垚、蓝江：《资本主义的雅努斯：资本抑或云地租——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对〈资本论〉的误读》，《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8期。

⑦ 蓝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评析——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审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5期。

⑧ 张源：《技术封建主义：数智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光明日报》2024年10月11日，第11版。

题上存在“五种形态论”“三种形态论”等多维解读，论争的焦点在于界定社会形态的标准以及马克思原始文本中的术语使用。^① 尽管在言说向度上存在分歧，但无人否认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地位，更不妨碍我们将马克思对社会主导生产方式的分析运用于思考技术封建主义。马克思强调：“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② 对于技术封建主义论者而言，不论是经济体系演变还是政治制度变革，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态都已在资本同封建要素的复杂纠缠中发生了范式转变。在数字资本全球性扩散的时代，究竟是否存在一种技术封建主义“普照的光”？我们可以立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整体性视域，分别探赜技术封建主义内在的悖反机理。

其一，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逻辑看待云农奴和云无产者的数字化生存状态。在瓦鲁法基斯的笔下，数字劳动者和接入网络的数字用户分别被描绘为技术封建主义条件下受压迫的阶级主体——云农奴与云无产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常使用农奴、无产者、工人等术语，在他看来，这些在历史上均属于被统治阶级的不同群体之间亦有差异，具体体现在他们分属的社会形态中“劳动对它的客观条件的关系”^③，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在封建社会，农奴对于赖以生产耕作的土地来说只是暂时的占有者，地主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所有者。^④ 从这一点来看，数字平台霸道地享有互联网络和数据资源库的所有权，而数字用户注册个人的账号 IP，在云端服务器上传照片、分享动态，确实像是从数字界域当中占得了可以独立开展数据生产的一席之地，这些数据又几乎无条件地被平台所储存收集，因此把数字用户喻为云农奴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在于，农奴之所以是农奴的根本原因并非他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而是“对那些和土地不同的劳动条件（农具和其他动产）的所有权”^⑤。对马克思而言，耕种工具、牲畜等生产资料首先得属于农奴所有，这是他们为占有土地的领主无偿劳作的先决条件，也是农奴区别于“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⑥的奴隶和“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⑦的工人的主要依据。由此，如果我们照着技术封建主义的观点把数字用户的数据生产界定为农奴劳动，那么用户借以劳动的生产资料——大数据集、智能推荐算法、后台服务器等的背后所有者显然依旧是数字平台而非用户，这显然不符合农奴的身份判别根据。同时，如果把外卖员、代驾骑手和网约车司机定义为茫茫数据云海中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那么他们在数字劳动过程中随行携带的接单手机、驾乘的电瓶车、可折叠自行车或机动车难道不是由劳动者自行配备的生产资料吗？技术封建主义所指认的那个可以提供无所不包的劳动条件的数字平台，实际上并未承担数字劳动者在送餐、载客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环节所需的生产资料。因此，脱离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云农奴和云无产者的身份界定是失之偏颇的。

其二，从劳动产品的分配逻辑看待云土地数据生产过程。在生产关系中，分配关系指的是劳动者对其劳动产品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对劳动者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的考察，可以把握一种

① 前一种争论围绕“分工”“交换关系”“生产方式”等社会形态划分标准展开，不论哪一种言说范式都涵盖着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前一阶段的封建社会的直接考察，因此并不影响本文使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分析技术封建主义的适切性。后一种争论围绕“经济的社会形态”“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有制形式”等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使用的话语表达进行语义辨析，本文采纳了清华大学王峰明教授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基础——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辨析》（《哲学研究》2021年第2期）一文中的观点：马克思经常把社会形态叫作“社会形式”，从而把生产方式与社会形式本质地联系起来，由此可以把握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四重逻辑。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

④ 王峰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基础——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辨析》，《哲学研究》2021年第2期。

⑤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8页，第891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2页。

社会形态的分配关系的基本特征。农民在缴纳劳役地租时，“直接生产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他为地主的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还是分开的，他为地主的劳动直接出现在为另一个人进行的强制劳动的野蛮形式上”^①。而在实物地租的条件下，尽管“生产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他为土地所有者的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已不再明显分开”^②，但其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也被严格分离开来交给不同的使用主体。也就是说，马克思把交租农民的劳动视为一个条理清晰、层次鲜明的范畴。但是，在技术封建主义的运行模式里，农民交租的形式转化为迪朗语境下的动态创新地租，这种新型地租基于数据信息积累的规模化和集中化，最终服务于掌握数据控制权的企业完成创新。比如，TikTok 宣称要“启发使用者的创造力并为大家带来欢乐”，但这种创造力和欢乐实则建立在精密的算法控制与数据觅集之上。从劳动产品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消费的方面来考虑，再去纠结哪些互联网行为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必要劳动，哪些按键触屏操作又成了被平台榨取的剩余劳动已经不再重要，因为生产数据的一切活动形式已经完全被亚历山德拉·斯凯格斯所说的苦役和免费劳动（原文使用的是一个捷克语词汇“robota”）^③ 取缔了。在其看来，所谓云农奴的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或剩余劳动，并且云农奴产生的浏览记录、实时流量等数据堆栈作为劳动产品在分配形式上则是完全由平台独断专属，而丝毫不归劳动者。更为紧要的是，在数字平台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条件下，数字用户的无偿劳动产品兼具使用价值和价值，它一方面被平台直接用于分析用户画像，另一方面又被算法精准投送给网络零售商以套取广告费，但是却始终不被劳动者自己所享有。不论是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对抗性关系趋于模糊看，还是从表现必要劳动和表现剩余劳动产品的非对称性分配关系看，封建主义都没有复活，反而与我们渐行渐远。

其三，从生产关系中的权力支配逻辑看待云地租剥削模式。技术封建主义的核心论点在于云地租对市场利润的替代。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权力支配形式已经由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背后所掩盖的间接剩余价值剥削，转为了云贵族对于云领土的直接掠夺。具体而言，封建地主利用暴力侵占或通过君主分封获得的土地作为纽带，实现对农民的人身束缚，而以科技巨头为代表的云领主则是征用并扩展领云空间，在那里借助数据隐私条款完成对用户的“捆绑”，这就是所谓的阶级依附形式改变（迪恩语）和流动性障碍（科特金语）。可事实果真如此吗？马克思敏锐地察觉到，封建关系依然有可能顽固地残存于资本主义时代，在对达勒姆联合教区矿业工人生活状况的考察中，他指出：“采矿业使农业短工有选择的机会。因此，在这些地方，租地农场主打破惯例，只承租筑有工人小屋的土地。小屋租金就是工资的一部分……工人要租这些小屋必须完成一定的封建义务，租赁契约就叫作‘bondage’[‘依附关系’]，按照这种束缚工人的契约，例如工人在外地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他的女儿或其他人代他工作。工人本人叫 bondsman，即依附农。”^④ 马克思在这里所要传达的是，农业短工就房舍居所同土地农场主达成的契约关系形式，并不是严格封建意义上的人身依附，而是一种在经济上的隶属地位，即便前者在职业选择方面拥有一定自由度，依然难以逃出资本增殖的“魔掌”。他们不管是外出采矿，还是归家为承租土地的农场主干活，抑或动员家庭财产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付出劳动力，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始终在工人阶级的生命全过程中起作用。由此，我们反观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便十分清晰了：弹性工作制允许数字劳动者同时拥有线上线下两份职业，他们可以像农业短工外出采矿一样回归传统雇佣劳动，也可以在闲暇之余把自己的劳动力外包给平台，与之结成不稳定的

①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2页，第896页。

③ Alexandra Scaggs, *The Node to Serfdom*, 2018-06-27, <https://www.ft.com/content/a940e9c3-9ed6-33b7-a191-d91ff4a4dfb2>, visited on 2024-12-19.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6页。

零形态劳资关系。在后者这层关系中，平台提供给劳动者或零售商的是类似于矿业工人住房舍一般的主播间、上架链接、店铺主页，以此换取相应的收入抽成或权限开通费用。仅从交易行为的表象上看，依靠云土地赚得收入确实同封建地主的收租形式极为相似。但是，云地租模式背后隐藏的依旧是服务于价值增殖的传统劳资关系，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削一刻都没有改变。在马克思的语境下，资本收入的剩余价值部分是在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它具体包含着利润、利息和地租。技术封建主义者的错误源头在于把市场利润直接等同于资本收入，将支付工资的可变资本（ v ）和剩余价值（ m ）混为一谈，从而纯粹凭感性经验得出了掠夺式权力复归的结论误判。简而言之，云租金仍旧从属于剩余价值范畴，在云贵族那里，它就是一种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高额利润。

其四，从生产力的发展逻辑看待云贵族的寄生基础。物质生产和生产力水平是马克思评定社会形态的主要依据之一。承接上述分析思路，在全球化的数字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下，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牢固不破，但全社会阶级关系形式确实发生了某种转移。这种改变不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而是产生于资产阶级内部，即以往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的资本周转循环被新的资本形式——平台资本所打破，这一后来者通过控制交换平台，垄断了商业销售和交易的途径，从而使原先的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成为其附庸者，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实则是不同资本间等级关系的重建过程。需要强调的是，数字资本并不是想要彻底取代产业资本和工业生产，而是要将原先商业资本负责的资本周转循环环节转移至自己设计的平台并从中榨取高额利润，在那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设定披着云地租神秘面纱的高额垄断价格。既然平台资本需要源源不断地获得利益，这就意味着产业资本的生产体系不仅不能崩溃，反而还要无休止地运行下去。此外，数字资本自身也在无限地驱动用户生产数据的自然力。在封建社会，“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但是它在农业上要起劳动资料的作用，还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较高的发展为前提”^①。马克思认为，彼时地主阶级的统治根基在于控制土地，因为这样也就间接地扼住了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限度，使农民仅仅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自觉地服从徭役。与此形成鲜明差异的是，当代数字资本推行着一套无所不用其极的生产力驱动机理：巨型数字经济体像地主一样掌控着云空间这一主要生产资料，同时还像奴隶主管理奴隶那样对用户的身體加以干预（通过算法偏好矫正或固化认知）。在数字劳动条件下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已经日益难辨，凡是接入互联网的端口，数据生产行为便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既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强迫性劳动，也有别于封建社会的间歇性劳动。可以说，平台对生产力要素的挖掘、调度和使用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阈值。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②平台资本通过对劳动资料（数据库）和生产工具（数据结构、智能算法等）的集中占有，突破了封建社会形态乃至一切前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力片面狭隘的发展态势，这也同步造成了“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的主体性困局。伴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演愈烈地延续，制约数据与平台共有化需求的资产阶级数字生产关系势必行将就木，少数平台资本家高度垄断高科技及其知识产权后企图挑战国家权力的梦想也注定化为泡影。

四、余论与展望：技术封建主义批判指向何方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作出了如下评价：“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

^{①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3—204页，第424页。

形式之前的……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① 这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审察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观照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进而澄明该社会形态自身的历史局限性。相较之下，国外马克思主义错把灵感萌芽于游戏设计乌托邦体验的技术封建主义高扬为社会新形态的论调就显得十分空洞、单薄与可笑。

数字资本主义的变化远远没有达到社会形态整体跃迁的程度，更不存在转段至另一个与之根本异质的新社会形态一说。在“两个必然”的科学洞见面前，引入任何一个新鲜时髦的社会形态术语都不能丝毫减损马克思思想的严密性。作为硅谷精英的反动意识形态结晶，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滥觞仿佛为我们上演了一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形记”。在这出理论闹剧面前，一味停留于粉饰封建等级制的暴虐过去的极右翼拿不出足够的合法性言说依据，而理论创新乏善可陈的传统右翼和左翼始终不曾触及驳斥技术封建主义的核心议题。囿于单一的经济或政治变化都不能成为界定社会形态质变的标准，我们唯有回到历史唯物主义，考证当代资本主义的病理症候，才能有效拆解世界上最强大的寡头和机构正在追求的一系列重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权力图谋。

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劳动产品的分配、生产关系中的权力支配以及生产力发展的多维视角审视技术封建主义，发现其存在庸俗理解利润和地租形式、泛化封建主义概念和背离政治经济学分析等多重缺陷，在对社会形态的分析中完全丧失了马克思的本真精神。着眼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形势，随着特朗普在马斯克的助力下入主白宫，我们不由得更加警惕西方发达国家右翼民粹政党的执政走向。披着技术封建主义外衣的数字资本运动每向前一步，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就更加有可能系统触发。如何勘破技术封建主义乃至技术民族主义等话语泥淖，唤醒底层无产者的主体性意识，加速使共产主义要素得到解放，迫切等待着我们予以回应。面向数字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为人类文明开辟出一条扬弃数字资本要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赵荣华）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57 页。